

中国经济转型 七问

两岸财经意见领袖眼中的中国经济

谭保罗 池薇 编著



大而不强之“痛” / 房地产之“怪” / 资本市场之“困” / 银行凶猛之“罪”
金融风险之“危” / 企业变革之“惑” / 经济弱势群体之“艰”

Seven Keys to
Chinese Economic Transition

中国经济转型 七问

两岸财经意见领袖眼中的中国经济

谭保罗 池薇 编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经济转型七问:两岸财经意见领袖眼中的中国经济/谭保罗,池薇编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4.8
ISBN 978-7-216-07998-3
I. 中… II. ①谭…②池… III. 中国经济—经济发展—研究 IV. F124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4650号

出品人:袁定坤
责任部门:大众纪实分社
选题策划:马骏
责任编辑:赵世蕾 丁雪
封面设计:天行健
责任校对:万山红
责任印制:王铁兵
法律顾问:王在刚

出版发行:湖北人民出版社
印刷: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字数:318千字
版次:2014年8月第1版
书号:ISBN 978-7-216-07998-3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
邮编:430070
印张:17.5
插页:3
印次: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定价:39.80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本社旗舰店:<http://hbrmcbs.tmall.com>
读者服务部电话:027-87679656
投诉举报电话:027-87679757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由本社负责调换)

卷首语

最近这些年，中国人从未如此自信过，也从未如此迷茫过。

过去的30多年，中国人的自信来自好看的经济数据，也来自对方向和路径的笃定，知道自己朝哪里走，怎么走。

回溯大约20年，那是朱镕基的改革。政府和银行分离，中国人开始懂得“财政”和“金融”的差别；推行两税制，让中央和地方明白在财政上应该如何互惠互利；改革国企，让国有部门“龟缩”到利润丰厚的上游，把下游的赚钱机会放给民间。

再回溯30多年，那是邓小平的改革。小岗村、经济特区、温州模式横空出世，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创造新的财富远比反复分配那点仅有的财富重要。

两次改革都让中国人得到了好处，但在方向上却截然相反。邓小平的改革是从上到下“放权”，金融财政大权向地方下放；朱镕基的改革则是从下到上的“收权”，金融财政大权向中央积聚。“收”和“放”并无对错之判，但“一收一放”则衍生出当今中国经济诸多“迷局”。

一直以来，我们在思考经济问题的时候，习惯从国际大势、国家竞争这类宏大背景去横向思考，容易忽视纵向的“经济史”。本书旨在打通中国经济的“横轴”和“纵轴”，把问题放置在30多年经济衍变的历史脉络中，和海峡两岸的财经意见领袖激辩中国经济最受关注的7个议题，从而寻找解开迷局的“密码”。

前言

中国经济的三块“石头”

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，《论语》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一本。可以说，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治国安邦和修身立德的法则。和“四书五经”中的其他几本较为典范的编排方式不同，《论语》只是一部孔子及其弟子对话的辑录。这种形式上的简洁和通俗，提高了这本智慧之书的传播效率，也决定了它影响的深远。

笔者比不上孔门先贤们的万分之一，但对这种“约其辞文，去其繁重”的表达风格却一直高山仰止。于是，从2011年至今，经过3年多的采访和修改，笔者也效颦而编著了这样一本对话集——一本关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“大白话”。

什么是“大白话”？除了简洁易读的对话形式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不绕弯子，直指问题的病灶；同时，力求站在多数人利益的立场之上，不为尊者讳，把那些悄悄拿走普通人财富的“隐形集团”昭告天下。在这方面，台湾经济学家那种特有的直率，尤其让人印象深刻。很多有关大陆金融问题的迷惑，全都被软软的“台北腔”一枪打烂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本书的全部。

从内容上看，全书有7个篇章，每篇只谈1个议题，7个议题基本涵盖了当前金融、经济领域最热门的内容。每篇之下的几个对话则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这个议题，全书共有33场对话。这种布局旨在既把具体问题谈得更深，也希望不丧失对中国经济转型大局的整体把握。

转型大局，势必要以改革来推动。在 2014 年的中国，“改革”几乎成为一种举国范围内的“政治正确”（politic correct）。所有人都在高呼“改革”，这两个字既成为了利益受损者的安慰剂，也成为了利益既得者的护身符。不过，对改革的激情歌唱和对改革的理性认知，两者往往存在着不匹配。

比如说，不少朋友都会认为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扩大“民营资本”的准入，但这种想法很可能忽略了中国已经形成的财富分配格局。当今中国，所谓“民营资本”其实早已被“异化”。“你懂的”儿子周滨投到石油行业的钱，不是“民营资本”吗？“房姐”在煤矿的投资，同样也是“民营资本”，对不对？实际上，与其让作为权贵阶层代理人的“伪民资”获得特许经营的权力，倒不如研究如何完善国企利润上缴和充实国家社保基金这些问题。

当然，笔者也同意：要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和中国企业的效率，一场产权改革在所难免。但改革也必须考虑在过去的 30 多年之中，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内部，究竟形成了怎样的利益格局，而这个格局又将如何影响今后的改革。很多时候，改革不是“另起炉灶”，而是“继往开来”。回头审视在“摸石头过河”的过程中，我们究竟摸到了哪些“石头”，往往比规划未来的蓝图更为重要。

在转型的节点，我们应该把这些“石头”亮出来，推敲它们的品质，探寻其对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意义，敲敲打打，有所扬弃，然后逐步完善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推演出更有操作价值的改革策略，也才能把改革的成本最小化，成果最大化。那么，“石头”在哪里？

简而言之，就经济层面的改革而言，这 30 多年来，我们其实主要摸到了三块“石头”。

“石头”之一：充分就业

2014 年，两件大事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。一是美联储对 QE 规模的调整，二是中国把 GDP 增速的目标从“保 8”调至“7.5%”。两件事其实共同指向了同一个议题，即充分就业的问题。

自从美联储建立以来，降低失业率便是其“法定职责”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这个国家就业问题的解决靠的是两个系统，一是美联储，另一个则是全球最发达的监狱体系。就中国而言，地方官对 GDP 的崇拜，其背后根源也是中央政府对就业问题的担忧。而“挖坑填坑”的 GDP 即是创造就业的最便捷方式。

就业问题即“吃饭问题”。1980 年代，中国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，

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的“吃饭问题”；但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生产力之后，之前放纵生育导致的“婴儿潮”又开始让农村出现了新的危机，即剩余劳动力不断出现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家喻户晓的“治安严打”，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城乡隐性失业的加剧，一度影响了社会治安。随后，中国选择了新的战略，即全面接收被亚洲“四小龙”淘汰的加工业，同时加入WTO。于是，中国第二次解决了“吃饭问题”。

但如今，加工业或者说制造业的根基正在被侵蚀，“饭碗”可能不保。一直以来，全球金融海啸被认为是“制造业危机”的首要因素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“内因”比“外因”更为重要：长期的金融抑制和利率体系的扭曲，正从根本上瓦解“中国制造”的金融基础。

“中国制造”始于70年代末，浙江人“鸡毛换糖”和香港人北上广东建厂是开端。这些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，绝大多数都没有和银行发生过借贷关系，民间借贷才是其融资的主流渠道。但这个渠道，正被冲毁。

一方面是楼市的疯狂，让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行业逐利，很多制造业企业关厂炒房。同时，这种行业“错配”，也使得提供给制造业的民间借贷资金供给减少，资金价格必然上升。

另一方面，权力逐渐让民间借贷体系长出了毒瘤。在很多地方，民间借贷的债主都有权力背景，它们其实可以称为“伪民资”，比如那些借钱给吴英的公职人员。权力的介入带来两个问题：一是资金在权力帮助下从银行体系流出，几经转手，必然层层加价，抬高企业的融资成本；二是权力使得借贷关系的约束机制逐渐“黑社会化”，负债企业家从“跑路”变成“跳楼”。

从以上这个金融运行体系的截面可以看出，重振“中国制造”，必须要改革，但改革并不仅仅是放宽民营银行准入这么简单。对那些“伪民资”放宽准入，必然导致更严重的寻租行为，并形成新的“食利集团”。最终，钱还会在虚拟的投机领域空转。要重振实体经济，让“充分就业”这个改革成果坚如磐石，我们既要和金融体系“动手术”，同时还必须把改革引入“更深层面”。

“石头”之二：中央集权

如果说解决“吃饭问题”是目标，那么中央集权便是快速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。

在秦朝之后，中国社会产生太平盛世的前提，一定是国家拥有稳定的中央集权体系。而所有王朝崩塌的根源，无不是因为中央权威的丧失，导致了国家的衰弱，最终被来自底层的怒火烧成灰烬或被异族攻灭。几千年来，中央集权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

经济发展的重要性，远远胜过所有西方政治理论中的“流行词汇”。

中央集权的形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，因为我们是世界上“内部不均衡”最严重的大国。比如，在明朝末年，陕西饥民已经“易子而食”，而江南却莺歌燕舞，东林党坐而论道。更严重的是，江南富商富得流油，而国家却财政困窘，只能向西北的贫苦大众摊派“三饷”，酿成民变。再看清末，华北平原的饥谨从未中断，这是义和团兴起的重要因素。而在工商业勃兴的东南地区，各省早已不听中央号令，八国联军入侵，竟抛弃慈禧太后搞“东南自保”。最终，清朝亡于地方独立。

对古代中国来说，“内部不均衡”的缓解有赖于中央来调配资源，而伦理和民心的稳固，也要依靠中央集权的支撑；同样，现代中国的经济增长，也离不开中央集权的推动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面临物价飞涨、地产泡沫和银行坏账等多重困境，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，正是通过90年代中期那次财税和金融领域的中央集权来完成的。但这次改革的影响也是双面的。

首先，财税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资金分配的界限，建立了“地方竞争”格局，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架构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，中国GDP增速再也没有低于7%。但改革遗留的问题也显而易见。一方面，财政资源高度集中，增强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，但也使政府容易形成以财政扩张支撑经济增长的“路径依赖”；另一方面，地方政府变成“公司”，“土地财政”成为主营业务，而由此衍生的高地价、高房价问题既拉大了各阶层的经济差距，也不断撕裂着各阶层的社会认同。

其次，该轮金融改革的正面意义重大，可以说为中国构建起了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体系。但金融资源通过巨型国有银行过度向上收拢，其后果必然是向下分配时的效率失衡和不公平。巨型央企坐享低廉的银行贷款，银行本身也有可观的利差收益，而留给普通储户和中小企业的则是财富的贬值和融资空间的逼仄。“影子银行”体系便由此而生。

此外，在直接融资领域，金融审批权也实现了向上的集中，股票发行“核准制”即是典型。“核准制”的本质，是把“决定谁上市”的权力从地方交易所收归中央部委。在这个制度之下，股市的市场机制被严重削弱。当“场外利率”飙升，股市的钱便会被迅速抽空，任何拉抬股市的努力都会徒劳无功。

因此，完全可以说，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次改革已经到了必须重新审视的时候。资源的集中可以提高体系的安全性，但也会降低体系的效率，最终再次危及体系的安全。“过犹不及”，这句老话一点也不过时。

“石头”之三：海外资源

除了内部的两块“石头”之外，我们还摸到了另一块外部的“石头”，即对外部资源的获取。

中国对国外资源的引进，远远早于对外资的引进。改革开放之前，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和华润这样的驻港“窗口央企”便开始为解决内地的资源短缺而努力着。埃及、巴基斯坦的棉花，泰国的大米，新马的橡胶，中东的石油多数都通过这些特定渠道流入内地，缓解中国人的资源之困。

可以看一个数据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，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不到20%。但从2008金融海啸到2013年这几年，这个数字已在50%~60%之间浮动，超过60%也指日可待。而中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，早已超过60%。大宗商品超高的对外依存度，其实折射了中国经济的另一种风险：海外资源的可得性。

不难发现，中国并不缺钱，关键问题是能否用适当的价格买到该买的东西。而这个问题的解决，往往和更深层面的因素相关。不妨举个日本的例子。日本是出名的资源穷国，70年前和美国开战的原因很大程度便是后者的资源封锁，而其不到4年就迅速战败的原因，同样是因为资源的短缺。战后的经济发展中，日本找到了出路。当制造业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后，日本人迅速在全球下单，四处买矿山，买农田，如今已成为“海外资源大国”。

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人在买资源时遇到的阻力远比如今的中国小。比如，就在各大资源类央企对海外矿商的并购频频受阻之时，我们却蓦然发现这些目标公司早已有着强大的日资股权背景。澳大利亚人曾抵抗过日本人的侵略，为什么他们的铁矿还会让日本人入股？很多人发出这样的疑问。

事实上，日本人对自我形象的革新历程被我们忽略了。

“一个日本兵，看上去活像用牛皮纸胡乱卷起来的包裹，又脏又皱，随时有可能散开来。他的绑腿不整，军衣肥大，裤筒宽松，罗圈腿短得可笑。”太平洋战争初期，美国作家威廉·曼彻斯特在《光荣与梦想》中这样描述欧美人眼中的日本人。在他们眼中，日本人丑陋、奸诈、残暴，而且不守信用，只会偷袭。但战后呢？日本人似乎成为了各国人民心中的谦谦君子，包括很多中国人也是这么认为。BBC近年的一项调查中，日本的国际形象甚至排名全球第二，仅次于德国。

日本怎么做到的？美国日裔学者涩泽尚子认为，战后初期，出于政治需要，美国政府开始在民众心中重塑日本形象。盟军统帅部抓住了两点，一是日本人的女性气质，

二是日本人的孩童形象。于是，美国传媒开始不遗余力地宣传温柔的“蝴蝶夫人”和“追逐美军吉普车索取糖果的小孩”这类形象。另一方面，则号召美国人对日本表现出负责任的“丈夫”态度和宽容大度的“慈父”作风。宣传上的独辟蹊径，效果好极了。

更重要的是，日本人更懂得主动迎合国际社会的需要。比方说，在“日本制造”横扫世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日本的文化输出也主要是“阴性的”，艺伎、奥特曼、阿童木……这些形象或温柔，或可爱。几十年来，通过这种一以贯之的形象强化，日本“好战者”和“侵略者”的本性被掩盖，留给人们的此种印象似乎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“女子般温柔”和“孩童般单纯”的国家气质表象。这种气质，是海外资源获取过程中最好的“政治通行证”。

对中国来说，作为一个能源、矿产乃至水资源都不充裕的大国，未来的持续发展，必定也越来越离不开对海外资源的依赖。要让资源的“买卖”更顺畅，我们也必须考虑“形象问题”了。

而遗憾的是，中国目前的形象经营主要是零散、自发的企业或民间行为，而其营造的多是“山寨仿冒者”和“土豪”的形象。这两种形象既会殃及中国企业的品牌打造之路，也会让中国变成跨国交易的“冤大头”。台湾著名投资银行家黄齐元说，国际并购领域已经开始流行“中国溢价”的说法：中国企业的收购价格，往往比他国的买家要高。这是因为卖家除了知道中国人有钱外，还善于利用海外对中国的误解来抬价。

营造具有亲和力的国家形象，不能光靠撒钱，这有赖于很多层面的改革和进步。可喜的是，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。

抛开那些学术化的金融和经济理论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以上三块“石头”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 3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最值得珍惜的经验。本书的 33 场访谈，尽管涉及面广，但从思想主线上来看，也是围绕着这三个特别是前面两个方面来展开的。朋友们在阅读每一个访谈时，如果都能围绕这三个维度来思考，很可能会有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。

【致谢】

本书能够最终完成，笔者必须感谢这 33 位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和财经界的前辈。如果您认为本书有大量“网上查不到”的内容，或有诸多可取的观点，甚至还启发了您对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重新思考，那么一定不是笔者的功劳，而应归功于这些睿智而敢言的人。他们是领域内最权威的人士，而且都正当盛年。未来 20 年内，他们仍会

是中国财经意见领域的主流力量。若有更深入了解相关议题的需要，各位可访问他们的微博和博客，继续“跟踪”他们。这种求索一定功不唐捐。

必须对那些在背后支持笔者，但未能在书中有所体现的人致以敬意。尤其需要提及的是，笔者之所以能够当面采访如此多的台湾财经界“牛人”，主要得益于深圳报业集团陈寅社长，《深圳特区报》张宝兴编委、刘众主任，深圳广电集团苏荣才编委、陈红艳总监的支持。此外，还应当感谢王欣、李焱、谢微微、王平、上官文复等领导的指导，还有徐皓、熊元俊、迟宇红、吴晓燕等同事的帮助。总之，没有以上这些人，本书将大大逊色，甚至根本不会存在。

还必须感谢《南风窗》杂志社的领导和同事们，在本书后期修改的过程中，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功不可没。

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，必须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马骏、丁雪和赵世蕾三位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，而总编辑王建槐更在百忙之中对本书提出了大量关键而宝贵的意见。谢谢你们！

最后向各位禀明：本书部分访谈的定稿并未经受访者最后审阅，如有贻笑大方之处，其原因必定是笔者的弩钝或记录上的偏差，和受访者无关。请朋友们见谅。

卷首语

前言：中国经济的三块“石头”

第一篇 大而不强之痛

这个世界从未发生过依靠 GDP 数字来保证经济长久繁荣的事。在乾隆时代，中国 GDP 已经是世界第一，但这一点用都没有。

企业的壮大和产业的发展，这才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崛起的不二法则。

篇章首语：东亚邻国的启示 / 2

货币、凯恩斯和国家兴衰漫谈 / 5

——台湾“清华大学”经济系主任 赖建诚

中国历史上的内部动乱有个特点，就是不存在政治和宗教问题，只有温饱问题，简单说就是“马尔萨斯陷阱”严重化。

日本金融强国“大跃进”的教训 / 17

——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孙立坚

我们的 GDP 已经达到世界第二，很容易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盲目自大。研究日本的泡沫是如何形成的，你会发现和我们今天有很多相似之处。

大国崛起不靠空话靠产业 / 25

——台湾新竹科技园管理局前局长 王弓

万一公营的资金赖皮怎么办？高新产业不都变成国营企业了吗？国营企业没效率，高新产业的竞争又比一般产业要激烈，它们怎么去国际上竞争呢？

财团模式为何让后发国家聪明崛起 / 37

——台湾大学副校长 汤明哲

大陆最终的目标是必须解决生产力的提升问题。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的说法，如果让土地变成“第一生产力”，那么经济肯定会出事。

第二篇 房地产之怪

通过投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，香港富豪推动了内地经济最初的勃兴，但他们也带来了土地资本化的“香港模式”。

对一座城市的资产价值暴增而言，“香港模式”是个好东西，但对一个大国的长期繁荣来说，这却是一剂毒药。

篇章首语：“香港模式”之弊 / 52

华人富豪为何都与房地产有关 / 56

——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创始人之一 张金鹤

开发商越养越大，它的势力也就越来越大。当局不敢动它，你动它，它就死给你看。台湾要“选举”，“选举”就要政治献金，对不对？

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犯逻辑错误 / 64

——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林祖嘉

假如台湾地区也像美国对房屋持有课税，台北市随便一栋房就三五千万台币，课税1%就等于每年交30万、50万，恐怕每一个人都会跳起来反对。

政府没有收取房产税的理由 / 71

——华东师范大学房地产系主任 华伟

城市土地为国有，购房者拥有的是70年连续使用权，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产权。没有真正意义的房产，你如何去征房产税呢？

解决楼市问题的根本是金融和税收 / 74

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易宪容

暴利的本质在于利用全国人民公有的土地资源，让住房成了极少数人赚钱谋取暴利的工具，掠夺与损害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。

中国应重新审视财税体制改革 / 78

——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主任 曾康华

一些地方政府有时会出来辟谣，但我认为房产税推行肯定是不可避免的，地方政府的财力总要找途径去填补。

第三篇 资本市场之困

在中国的帝制时代，国家政权会积极保护自耕农不被大地主兼并，只要他们有独立的财产（土地），就可以直接向国家交税，从而确保王朝的繁荣。

在现代的中国，监管部门却很难保护好普通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财产，所以中国人都去买楼，而置“国家号召”于不顾。

篇章首语：股市不应再做“小三” / 84

百部法律为何管不好股市 / 88

—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证监会发审委委员 李曙光

一些案件不但判罚轻，而且缓刑也用得太多。你想想，坐一年牢就能出来了，还怕什么？

资本市场的边缘地位应改变 / 94

—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、证监会发审委前委员 吴晓求

寻租者成了股东，并不一定能使企业上市，他们常说有打通关系的能力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但他们确实有能力让企业上不了市。

中国人距离价值投资还有距离 / 99

——台湾元大宝来投信总经理 刘宗圣

在大陆，上市企业老板在外面有公司，然后和上市公司有业务往来，这再正常不过。但在台湾，可能要蹲好多年监狱。

大中华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在哪里 / 108

——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理事长 黄齐元

大陆的机构法人不发达，根本没人去捧你的蓝筹股。小股民的兴趣是创业板，因为那里有暴富的希望，买蓝筹股还不如买楼，对不对？

第四篇 银行凶猛之罪

局部试点，然后全面推广，这似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宝贵经验。尤其对那些用常识就能解决的简单变革来说，这种循序渐进的模式非常有效，可以把阻力减少到最小。

但世易时移，金融市场的改革却很难通过这个模式去解决。让农民承包土地安心种地和改革金融市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。

篇章首语：金融改革没有“小岗村” / 118

企业的钱为什么让银行赚了 / 122

—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

对银行来说，只要能海量放贷，外加利差保护，它就能赚个够，自然也没有改变的动力。因此，如果宏观融资结构不改变，银行转型就是天方夜谭。

银行改革的方向是主体多元化 / 126

—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

有一位地方银监局的官员问我，20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？我告诉他，20年前，到银行借钱不一定要还，但现在，借钱不还已经不行了。

推进利率市场化不要再搞“双轨制” / 131

—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

不同市场主体如果面对不同的资金价格，则意味着不公平的市场环境。部分主体可以在管制的利率条件下获得低成本资金，比如一些大型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；另一些主体，比如中小企业，则不得不承受较高资金价格。

过分城市化不如力推金融改革 / 134

——海通证券副总经理 李迅雷

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也是企业高杠杆率的原因。比如，在很多人看来“银行是国家的”，这就很容易想到民企高杠杆率的背后，必然有银行内部人员拿了“好处”。

终结银行暴利的“台湾经验” / 143

——台湾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黄达业

大陆银行业的利润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，为什么要把钱让外国人赚呢？你居然给外国人，你卖给台湾嘛，至少利润还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己赚了。对不对？

第五篇 金融风险之危

现在很多人都在谈金融风险，但热钱、坏账、影子银行和债务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。

最大的风险在人心，即社会的信用基础。

篇章首语：最大的风险是信用风险 / 154

中国不可忽略“僵尸银行”的风险 / 158

——广东金融学院院长 陆 磊

为什么我们发了这么多货币，但却没有出现危机？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外部保险，那就是人民币有一个升值预期。

“中国特色”债务问题的危险和契机 / 165

——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 朱 宁

中国的债券交易其实就是银行之间互相买卖对方的贷款，风险最终仍然停留在银行系统里面，没有分散和传递出去。

热钱，你想把中国怎么样 / 170

——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 黎友焕

还有人把人民币升值和房价上涨的双重收益作为诱惑，来鼓励一些境外热钱投机房地产市场。

富人的钱为何时常危害经济 / 174

——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中心主任 翟立宏

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：中国信托业除了信托业务不做之外，其他什么都做。

第六篇 企业变革之惑

中国的企业为何不如它的 GDP 那样出色？很多人必然会说到产权问题。

但除开产权问题，针对商业本身的探讨更具有操作层面的价值。

篇章首语：中国企业的“后发劣势” / 180

“中国制造”为何撑不起“中国内需” / 185

——首都经贸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 陈立平

在美国西尔斯百货只要 200 美金的普通西服，在中国的售价高达 2500 元。如果按购买力计算，这个价格大约是美国的 10 倍。

钱多了为何让企业做“傻事” / 191

—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系主任 丁 远

作为北京、广东当地的明星企业，遇到很多问题，政府会主动给你“熨平”。问题在于，把跟政府的默契当成核心竞争力，到了国外必然“两眼一抹黑”。